

# 社会学大有作为<sup>\*</sup>

李 铁 映

同志们:

我首先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在座的所有学者、同志们、朋友们,感谢两位学界老前辈——95岁的雷洁琼教授和90岁的费孝通教授到会讲话。他们一生对社会学钟情、执着,对学界后辈寄予厚望。我们一定要承继前辈在开风气、育人才方面的传统,开启今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之门。

今天,老中青社会学工作者在这里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成立20周年,这是一件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重大意义的事情。过去对社会学争论了很长时间。社会学到底是不是科学?它应该研究些什么问题?回答些什么问题?正是由于“文革”10年动乱的深刻教训,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学是一门很重要的社会科学,应该重建它,补上这一课,很好地用这门科学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社会学恢复和重建以来这20年,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人民大踏步前进的20年。还很少有这样的历史机遇和历史巨变: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体制、思想观念以及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变化。正是在这20年,社会学恢复了、发展了,并在脚踏实地的深入研究中取得了丰硕成果,这就是中国社会学20年的足迹。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也是社会科学研究必须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基本原则。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所谓实事求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结合,就是要通过对中国实际问题的研究来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显著优点,也正在于它注重实地调查的传统。毛泽东同志20年代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至今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础文献,他所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以说是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和前提。因为研究社会,只有从社会的实际调查入手,才能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

早在改革之初的1979年,小平同志就向全党提出:“四个现代化靠空谈是化不出来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小平同志讲话后,中央决定迅速地恢复和重建社会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学科。

20年来,通过老一辈社会学家的传帮带,在继承社会调查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我院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调查,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数据,也写出了一批很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和学术文章,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重大的贡献。

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费孝通先生关于“小城镇”的研究,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也

<sup>\*</sup> 在庆祝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00年3月21日。

为推动中国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在 80 年代读了费老的《小城镇 大问题》这篇文章后,更加感到中国完全有可能在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时候,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所走过的道路,也完全有可能依靠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和传统文化的优点,在小城镇的基础上集中乡镇企业和农村的一些传统优势,形成星罗棋布的、各有特色的小城镇这样一种结构和布局,来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也是在这篇文章的启迪下,我开始研究了一些城市学的问题,还参加了我国第一次城市学研讨会,也发表了一些观点和意见。在改革初期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费老这篇文章极富远见地提出了小城镇发展在今后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发挥了社会学研究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今天,对于社会学这门学科,对于它 20 年来取得的成就,对于社会学在促进社会发展与稳定中的作用,中央、社会科学院以及社会科学界,都是充分肯定的。我来社科院之前,在国务院分管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文化和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深感社会学的重要,并从社会学中受益匪浅。我十分看重这门学科。

中国目前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期,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在 20 年中发生了极其深刻和巨大的变化,这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这为社会学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应当说,现在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学大有作为。

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前人没有遇到过,也没有现成答案的新问题,需要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人员去深入探讨,作出回答。中国社会经过几千年的绵延发展,今天第一次进入小康社会,虽然我们历史上有过盛唐,有过宋代经济和科学的发展,但还不能把那个时代就看成是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国,真正解决了温饱问题并进入小康社会是在今天。那么,小康之后的中国社会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也没有现成的答案,可能西方的发达国家在一百多年前已经进入了小康社会,但对我们来说,这是在新世纪门槛上需要深刻认识和研究的新问题。在没有进入小康、温饱没解决的时候,首先讲的是吃的问题,那么在解决温饱 and 进入小康以后,会更多地想社会的文化精神生活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现代化事业正在推向前进。我国的几亿农民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究竟是什么?中国实现小康社会后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哪些深刻变化?社区组织形式在新形势下会有什么样的特点?家庭在今后的社会发展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些新形势下的新问题,都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回避的。

我这里还想特别谈一下家庭。中国进入小康社会以后,家庭问题将以新的形式提到社会学的面前。随着社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家庭的一些传统功能是不是会被取代?是不是要发生一些变化?现在,在一些发达国家,家庭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现象,但现代化是否就意味着家庭的破碎?破碎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孩子能否是幸福的孩子?没有幸福的孩子和幸福的家庭,会不会有幸福的社会?我们不是在讲人权、讲民主吗?不是在讲幸福、讲富裕吗?不幸的家庭可能制造多少不幸的孩子?将为社会带来多大的痛苦和困难?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础和细胞,幸福的家庭是构成幸福社会的细胞与基础。

再比如,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迁徙,一般都是由战乱和灾荒所致,而现在出现的近亿人的民工流动,其原因是根本不同的。这反映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的潮流和趋势。我们要花大力气引导它,使之有秩序、有步骤地沿着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前进。通过深化改革来调整城乡关系,推动我国的城镇化。当然,我们要认识到这样的问题不是一天两天形成

的,解决起来也需要时日和相关的政策、制度、法规;并且,也不能只看到人口流动和迁徙的正面效应和正面意义,也应研究一下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迁徙会产生哪些与之相伴随的新问题,特别是有哪些新风险,真正让它成为有利于而不是不利于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变迁过程。

中国社会学的历史任务以及自身学术地位的确立,就在于能够回答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这类重要问题。否则社会学就很难有它的地位和价值。中国的猫要能够抓中国的老鼠。只有能够回答中国现代化道路中的根本问题,只有抓住那些现实中的重大问题和学术上的前沿问题,集中力量,坚持不懈,长期跟踪,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

社会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其他单一学科难以回答的问题。社会学有其综合的优势,有其独特的视角,有其整体的维度;这就是它的地位和价值。有人问,中国的社会学和世界社会学是什么关系?有没有中国的社会学?我且不去说有没有中国社会学,但是中国的社会学家首先要回答中国的问题,这种回答就是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的开始。

我们的社会学研究人员,一定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做深入扎实的实地调查,建立一些观察点、调查点,跟踪几十年、上百年,这样才能揭示社会变迁的历史轨迹。

我们的研究还要有前瞻性,这就要求我们借鉴别人的研究成果。因为有些问题别的国家今天遇到了,我们可能明天也会遇到;也有些问题别的国家已经遇到过,对于我们可能还是新问题。

总结历史的经验和学术发展的规律,只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才能保证科学和艺术的繁荣与发展。要想百家争鸣就要有学派,但学派不是宗派,宗派不搞团结,而持不同观点的学派和学者之间可以建立良好的友谊,不是“文人相轻”,而是“文人相亲”。我们要反复强调学术上要解放思想和百家争鸣,允许用不同的观点、方法去从事研究,要鼓励交流,互相取长补短。

我们要大胆地学习、借鉴和吸收一切科学的、现代的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用科学的、现代的手段去进行社会学探索。这其实也是我们社会科学院现在面临的问题之一。目前我们的研究手段还比较落后,这与需要回答的极其复杂的当代问题很不适应。加快实现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的现代化,是站在新世纪门槛上的社会科学的迫切任务,否则我们就难以满足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

我们也要继承一切行之有效的传统研究方法和调查技术,从不同学科,包括从自然科学借鉴其方法和手段。对于人类历史文明中积累下来的丰富成果,我们都要继承。我不认为文明之间“必然”要发生冲突,文明之间首先应该相互补充、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融合。任何有生命力的文明形式一定是具有包容性的,具有较强的学习、借鉴他种文明的能力,一定是包含着社会进步发展的因素,朝向人类的光明未来的。即使一种文明形式消失了,它原有的合理内涵也会被其他文明所吸纳、所继承,而不是被彻底毁灭掉了。

当然,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是有原则的。对于一些探索性的问题,可以而且应当展开积极的讨论和争论,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必须讲政治,因为社会发展本身就包含政治的内容。

我们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提倡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学术争鸣,就是要探索真理,为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提供保证,提供科学依据,提供精神动力,而决不是相反。如果一种观点和理论导致社会的动乱,影响社会的稳定,延缓社会的发展,我们是不赞成、不接受的。社会学要为社会发展与稳定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服务。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学研究也必须有敏锐而强烈的时代感。我们的社会

学工作者，要敢于迎着时代风浪。这当然不是要大家去追风潮赶时髦，去充当什么“泡沫明星”，而是要敢于做时代的弄潮儿，敢于用科学的视角和眼光去正视大变革时代提出的种种难题，并且从广远的时空视野、以坚实的实地调查和长期追踪研究为依据，去回答这些难题。

让我们以中华民族特有的博大胸怀，热烈地拥抱新世纪，纳百川、采万花，创造新世纪中华民族的新文明，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学者、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理想和责任，也只有这样，社会学才能无愧于我们的伟大时代。

---

## 从 实 求 知<sup>\*</sup>

费 孝 通

各位领导、各位朋友、同志们：

我很高兴今天能参加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20 周年的纪念会。我想不到我还能参加，我这个年纪了，能够参加我感到很高兴，很光荣。20 年前这大楼还没有，我走的时候还没有造这个大楼，最早我们的社会学所从民盟借了一间房子，几个人就搞起来了，和现在不能相比。现在我感想很多，首先从我个人讲，我已经到了最后几年了，再有几年自己说不定，可是我还是想多活些年，多做点事情。我退休之后，主要还是做学术工作。这几年主要做的工作，我自己叫补课，不是小平同志叫我们社会学要补课吗？社会学是一门学科，从整个学术界讲我们要补足它。从个人讲，我也要补课，因为我这一生同社会学差不多，坎坷得很。我从 50 年代开始，就差不多脱离学术界了，没机会念书了，一直到现在，50 多年了，1957 年开始也 40 多年了，差不多半个世纪了，最近 20 年，我才重新回到学术队伍。50 年前，解放之后，李维汉同志把我调出来搞民族工作。我到了西南民族地区做深入调查，访问少数民族，到现在也还是有用处。这之后，大家都知道，我二十几年里不能看书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社会学研究所的建立又开始了我的学术生活。那时候乔木同志找过我，先把我放在民族研究所，因为我从民族学院调过来的。后来，因为要开办社会学，所以乔木同志把我调到社会学所。从进来到现在 20 年了。今天是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对我个人讲也很值得纪念，是我恢复学术工作的第一步。我脱离了这么久，没有本领了，心里觉得很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恢复重建社会学这个任务没有好好完成。从社会学恢复第一天起，我就开始补课，从头补起，从什么是社会学补起，补了一点，将来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希望还要补下去，尽力去补吧。其实大家也应该补这一课，我们的基础不好，我们从外国引进了这门学科，并没在中国生根。我是这么看，不知对不对。因为社会学要研究自己的中国社会，我们对中国社会还不认识，历史这么长，人又这么多，要理解中国人的生

\*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建所 2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